

# 邓小平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 探索、发展和创新

任晓伟 张璇颖

(陕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 在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邓小平作出了杰出贡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进行了艰辛探索, 深刻认识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必然性和重要性。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邓小平在坚持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实践内涵。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后, 邓小平在新的条件下不断创新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理解, 把党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认识和实践提高到新水平新境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新的理论和实践高度上不断提升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认识和把握, 指导着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不断走向新的辉煌。

**[关键词]** 邓小平 实事求是 党的思想路线

**[中图分类号]** A84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2X(2024)08-0012-07

DOI:10.16075/j.cnki.cn31-1220/g4.2024.08.00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事求是, 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 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 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sup>[1]</sup>创立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中取得的最为重要的成果, 是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取得的最为宝贵的经验, 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人民群众不断创造历史辉煌的最为根本的原因。在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邓小平作出了杰出贡献。在邓小平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探索、发展和创新中, 蕴含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智慧。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新的理论和实践高度上不断提升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认识和把握, 指导着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

伟业不断走向新的辉煌。

## 一、邓小平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探索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反复强调,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 而是行动的指南。但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来进行把握和实践, 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课题。中国共产党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 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创造性运用到党的全部工作之中, 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深刻回答了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这一课题。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产物,

**[作者简介]** 任晓伟, 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原创贡献研究”(项目批准号: 21&ZD019)。

又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更深入结合的根本保证。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着眼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在升华此前关于“反对本本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地阐述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内涵,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sup>[2]</sup>7月,毛泽东出席马列研究院(由马列学院改建而来,后又改为中央研究院)成立大会,并作题为《实事求是》的报告,要求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调查研究敌友我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sup>[3]</sup>这奠定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形成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理论基础。经过整风运动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后,实事求是的科学思想力量被全党广泛认同并被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指导中国革命不断走向新的胜利。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进行了独特的探索并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4年2月,邓小平参与编辑的旅欧共青团机关刊物《少年》杂志改名为《赤光》,《赤光》创刊号发表的《赤光的宣言》指出:“我们是要以科学的方法,综合而条理出各种事实来证明我们的主张无误。”<sup>[4]</sup>这里已经包含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萌芽。1927年2月,邓小平从苏联回国后,立即投身到大革命的斗争洪流中。大革命失败后,邓小平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断思考和探索中国革命的出路。1929年8月,邓小平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前往广西,领导中共广西党组织的全面工作。12月,百色起义爆发,成立了红七军,创建了右江革命根据地,并召开了右江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1930年2月,龙州起义爆发,成立了红八军,建立了左江革命根据地。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这片红色区域的创立,成为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重要实践形态。在领导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邓小平不断思考

和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1931年4月,邓小平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七军工作报告》中详细报告红七军、红八军的建立和战斗经过,以及左右江地区地方党的状况及土地革命的工作,并总结了百色起义、龙州起义的经验教训。邓小平指出:“七军的中心错误是处处以军事为中心,而不是以群众为中心来决定一切问题,在右江攻滇军,攻武冈,攻连州,均是如此。一路处在被动地位,到处站不住脚,一直跑到赣南。忽略了群众的工作。”“七军一部分是转变过来的旧军队,一部分是斗争未深入的农民,即使立三路线没有传达到七军,七军仍会犯不以群众为中心而以军事为中心的错误的,走到立三路线。”<sup>[5]</sup>邓小平对红七军、红八军斗争经验和教训的思考,深刻体现了1929年12月毛泽东在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上对中国革命斗争的理论总结,表明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和科学的思想方法已经成为革命斗争实践中的客观的必然的要求。

1931年8月,邓小平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面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中“左”的路线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斗争,邓小平坚定支持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主张。在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和领导瑞金土地分配时,邓小平积极实行毛泽东提出的“平均分配土地”、“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政策。<sup>[6]</sup>1932年6月,邓小平在担任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后,积极贯彻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抵制“左”倾教条主义和军事冒险主义。在“查田运动”中,更是鲜明强调不能侵犯中农利益,也不要打击富农,抵制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土地政策。<sup>[7]</sup>为此,邓小平受到苏区中央局的严厉批评。1933年3月,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中央苏区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决议》,提出“要坚决打击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的领导”,<sup>[8]</sup>并被作为江西“罗明路线”的创造者受到“最后严重警告”。<sup>[9]</sup>即便是这样,邓小平仍然坚持正确的主张,在被迫写出的检讨书《会、寻、安工作的检查》中,邓小平陈述了会昌中心县委从会、寻、安的实际出发开展的各项工工作,提出在粉碎国民党粤军的大举进攻中,不能搞“堡垒对堡垒”、“拼消

耗”，而应采用坚壁清野和游击战、运动战的作战方针，<sup>[10]</sup>反映了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坚定政治毅力和理论品质。

长征结束后，随着军事路线、政治路线的调整，全党对党的思想路线的探索进入新阶段，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探索也进入新阶段。1939年1月，邓小平在一次讨论关于民众工作的原则时指出：“党外要反右，党内要反左。要实事求是，团结全党。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灵活的革命的实际主义，前进的、坚定的奋斗精神，大众的民主主义作风。”<sup>[11]</sup>从现有文献看，这是邓小平第一次使用“实事求是”的概念。此后，这一概念逐步成为邓小平使用的“经常语”与“常用词”。比如，1944年3月，邓小平在讨论冀鲁豫工作的一次讲话中说：“整风中领导者主要注意防止‘左’，实事求是地考虑问题。”<sup>[12]</sup>1944年9月，邓小平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北方局会议讨论审干工作时指出：“在整风平反阶段，要注意实事求是，既防止过去肯定一切，又要防止现在否定一切的毛病。”<sup>[13]</sup>这些重要认识既体现了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也体现了对中国革命前途的深邃思考。

在探索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过程中，邓小平深刻认识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然性和重要性，从而更加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1943年6月，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和一二九师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的报告中，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科学一定要运用于实际，才能表现力量。因此，绝不是简单的输入问题。党的历史发展再三地教导我们，凡是以教条主义方式对待马列主义就会使革命遭受损失。我们永远是马列主义者，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运用马列主义的原则使之切合于中国实际。”<sup>[14]</sup>1943年10月，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第八期开学典礼上关于整风运动动员报告中，邓小平指出：“我党自从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后……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直到现在已经九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sup>[15]</sup>从这一时期的革命实践

来看，无论是在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期间还是担任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局书记期间，无论是在坚持大别山斗争期间还是在解放大西南期间，邓小平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中国革命解放战争胜利和中华民族解放作出了卓越贡献。

## 二、邓小平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发展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sup>[16]</sup>实事求是本质上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统一。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一时期，邓小平无论在什么样的工作岗位上，都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在坚持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实践内涵。

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在主政中共中央西南局期间，坚持强调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精神。比如，1951年6月，在西南局致西南各省区党委电中征询对抗美援朝募捐数额的意见时强调：“现有各地捐献有无困难，应减多少请作一实事求是的估计。”<sup>[17]</sup>1951年10月，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五十八次办公会议讲到增产节约时说：“要采取各种方法节约，每个单位都要考虑节约，包括人力、物力两方面。要实事求是，真正要多少人就用多少人，主要从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来解决问题。”<sup>[18]</sup>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共产党员除了应成为执行共同纲领和遵守法纪的模范之外，还需要具有纯正的作风，就是要有不怕麻烦、谦逊朴素和实事求是的作风”，<sup>[19]</sup>“着眼于十分重视民族问题，谨慎地决定政策，严防‘左’的偏向”，<sup>[20]</sup>“结合实际情况做好各项主要工作”<sup>[21]</sup>等重要思想，在贯彻党中央大政方针政策的过程中，领导快速恢复了社会秩序，使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等呈现出新的发展面貌。

1952年7月，邓小平调任中央工作后，更加自觉地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出发来思考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具有总体性、战略性的问题，形成了一系列新的重要认识。

第一，创造性初步提出了生产力的发展标准。1957年1月，邓小平在清华大学师生大会上的报告中说，社会主义“这个制度好不好，决定于是否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sup>[22]</sup>1961年1月，邓小平在接见外宾的谈话中指出：“如何搞社会主义主要看两条，一群众满意，二发展生产力。群众是否满意、支持是判断事物好坏的标准。”<sup>[23]</sup>1964年1月，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衡量我们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我们能不能发展生产力，能不能比较快地实现四个现代化。”<sup>[24]</sup>生产力标准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根据生产力标准，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矛盾时必须把调整 and 改革生产关系作为主要矛盾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1962年7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农业问题时的讲话中，邓小平说：“现在所有的形式中，农业是单干搞得最好。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生产，就用哪一种方法。”“总之，要实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sup>[25]</sup>这里，鲜明体现出邓小平运用生产力标准来分析和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问题的方法论特点，体现出实事求是的强大方法论力量。

第二，提出科学认识和合理安排发展的速度。针对中国在落后的经济社会条件基础上进入社会主义的特殊国情，邓小平这一时期反复强调：“我总讲这个道理，不要那么急，大家一心一意，哪个搞得最快，哪个地方搞得最快，就先搞哪个。有了这一条，就会多快好省得更好。要不然，牵扯很大。无非是慢两年，慢两年是最现代化的。”<sup>[26]</sup>要建立一个完整的、独立的、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体系，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完成现在这样的目标大体上需要二十年时间”。<sup>[27]</sup>如果从赶超发展的任务来看的话，“我们要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还要几十年的努力”。<sup>[28]</sup>如果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来看，“看来社会主义是一个独立的很长的时期，这不仅因为有国内因素，还有国际因素”。<sup>[29]</sup>在比较长的时间里，“中国总的面貌还是算正在发展中的不发达国家”。<sup>[30]</sup>邓小平强调合理的发展速度，本质上要求根据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科学认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在合乎规律的历

史创新中实现中国共产党的雄心壮志。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总之，我们要有雄心壮志，是实事求是、合乎实际、留有余地的雄心壮志。”<sup>[31]</sup>

第三，积极地把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转化为领导发展的科学工作方法。在邓小平看来，“方针和路线不结合实际就没有生命，是死的”。<sup>[32]</sup>实现这一结合的根本方法就是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在这个意义上看，实事求是也是党领导发展的科学方法。“所谓实事求是，就是要承认千差万别、大同小异。大同就是大的方针政策，小异是重要问题。大同要调查，小异也要调查。”<sup>[33]</sup>1958年12月，邓小平在参加周恩来召集的讨论工业问题的会议上的发言中，明确地把实事求是与领导发展的方法等同起来，指出：“党对抓工业的经验不足，要形成比较完全的经验还需要若干年。总之，要实事求是！”<sup>[34]</sup>针对“大跃进”运动过程中一些干部的盲目热情和主观主义的领导方法，邓小平深刻地指出：“教训是深刻的或是沉痛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受了损害。为什么不实事求是？就是方法出了问题。实事求是，就是对实际情况真正了解。真正了解实际情况，就要调查研究。”<sup>[35]</sup>因此，在1960年5月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国家计委党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补充计划建议的报告》时，邓小平特别强调：“报告中第一段要加上实事求是、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和群众路线两个内容。”<sup>[36]</sup>这体现出他对实事求是作为基本方法的独特理解。

第四，推动把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转变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的优良作风。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是可以看得见的党性。邓小平长期以来坚持从党的优良作风来理解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大跃进”之后强调得更多，也更集中。1960年6月，邓小平在出席刘少奇主持召开的有各大区和省、市、自治区以及中央一些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尖锐地指出：“我们一定要估计到，有这样一部分同志，相当程度地丧失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sup>[37]</sup>1961年3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报告会上说：“一九五八年以前我们党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还是保持的，一九五八年以后我们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削弱了，‘浮夸风’就是

实事求是的对立面。”<sup>[38]</sup>1961年11月，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共产党员，特别是共产党干部，首先要实事求是，要讲真话，要当老实人。现在当老实人不容易，都不大愿意当老实人。其实，革命就是当老实人干出来的。”<sup>[39]</sup>1961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这几年，我们有好多事情不是实事求是。……拿共产党员的党性来说，就是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就是宁肯吃亏。有了这一点，就有全局观念。”<sup>[40]</sup>1962年2月，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风，联系群众的作风，自我批评（当然也包括批评）的作风。总的来说，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实事求是的作风。”<sup>[41]</sup>在这些重要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把是否保持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作为衡量是否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标准，表明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与广大党员干部日常工作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既深化了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理解和实践，也扩展了对党的优良作风内涵的认识和把握。

### 三、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创新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面对时代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邓小平以“实事求是派”的巨大政治和理论勇气强调，“我们要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sup>[42]</sup>“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sup>[43]</sup>从而科学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解决了“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样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sup>[44]</sup>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在新的条件下不断创新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理解，把党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认识和实践提高到新水平新境界。

第一，完整地概括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科学内涵，并以党章的形式巩固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

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sup>[45]</sup>“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领导全党在对“左”的错误的科学总结中，以新的认识自觉和实践自觉重新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这个基础上，邓小平又不断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内涵。1980年2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我们说重申，就是说把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恢复起来。”<sup>[46]</sup>这表明，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四个方面构成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因素，这既是对什么是实事求是的科学认识，也是对如何才能做到实事求是的科学回答。在邓小平这一重要论述的基础上，党的十二大修订的党章在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和完整地阐述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内涵，指出：“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sup>[47]</sup>

第二，科学提出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性问题。从认识论来看，“实事”是认识客体，“是”或者规律是认识目标，党则是认识主体。实事求是是在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统一的基础上不断发现“是”的认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党作为认识主体的精神状态对于科学认识和把握认识客体具有重要影响。针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初期教条主义对党的严重影响，邓小平以其历史深刻性和深沉忧患性振聋发聩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sup>[48]</sup>为什么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后，还会在理论和实践上出现教条主义？对这一问题的深入反思必然要引向对解放思想问题的思考。“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sup>[49]</sup>解放思想不是抽象的，而是和实事求是内

在地结合在一起的,或者说,是为了做到实事求是,才不断解放思想。在这个意义上讲,“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sup>[50]</sup>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统一起来进行融合性理解和把握,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认识,也是邓小平多次强调的重大理论、政治和实践问题。1982年11月,邓小平在同外宾的谈话中指出:“解放思想就是毛主席提倡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sup>[51]</sup>1983年11月,在同外宾的谈话中邓小平更是直接地指出:“我讲的是真正解放思想,也就是实事求是。”<sup>[52]</sup>只有在统一中把握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才能在实践中做到有“左”反“左”,有右反右,这也是邓小平所说的“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sup>[53]</sup>改革开放的历程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作为认识主体在解放思想的精神状态中认识时代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是做到实事求是的坚实保障。因此,解放思想也就成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不可缺少的要素。

第三,把实事求是提升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并把实事求是确立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进行贯通性理解,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面对的重大课题。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后,邓小平对解决这一重大课题的卓越贡献就是通过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创新性认识,形成了从马克思主义到毛泽东思想的整体性理解。1978年5月,邓小平同胡乔木等谈准备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的内容时,特别提出要着重讲实事求是问题,并指出:“实事求是马列主义哲学的概括,是马列主义理论、马列主义方法的概括。”<sup>[54]</sup>1978年12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事实

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sup>[55]</sup>此后,邓小平一直在哲学认识论的高度上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三者的同一性关系,多次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sup>[56]</sup>“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sup>[57]</sup>这构建起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新的理解,也奠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的基础。

与此同时,邓小平提出要从事体的科学性上来把握毛泽东思想,把实事求是确立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并反复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sup>[58]</sup>“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sup>[59]</sup>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sup>[60]</sup>“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sup>[61]</sup>“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sup>[62]</sup>把上述这些认识归结到一起来看,很显然,邓小平对实事求是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这一基本观点的强调,贯穿了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后他的整个思想发展过程,并以实践为中心科学回答了如何在新的条件下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一问题,这也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基础上把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宣传贯彻推进到新的阶段。

第四,把实事求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理论基础。在开创新道路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把回望过去、推进当下、远眺未来高度统一起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的显著特点和优势。邓小平在领导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过程中,充分认识到“我们现在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sup>[63]</sup>他坚持边探索边总结的基本原则,不断把对这条新道路的认识和实践引向深入。在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总结中,强调最多的问题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问题,认为改革开放后最根本的问题是重新回到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轨道上来了,他指出:“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

制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思想路线是什么？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坚持毛泽东同志说的实事求是，坚持毛泽东同志的基本思想。”<sup>[64]</sup>同时，实事求是也是改革开放进程中最根本的原则，邓小平认为：“总之，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实事求是。”<sup>[65]</sup>“我们取得的成就，如果有一点经验的话，那就是这几年来重申了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sup>[66]</sup>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坚持，奠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最为重要的理论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发展战略和发展体制，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形成了一系列开创性的新认识，在理论和实践的相结合中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新的时代高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重要的思想特点，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遵循的思想方法。”<sup>[67]</sup>邓小平在探索、坚持和创新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过程中形成的重要思想，是我们党的一笔宝贵理论财富、政治财富和精神财富，激励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思想，在一系列新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到新水平，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特别是其中的世界观、方法论，以新的视野和新的结论进一步科学回答了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如何认识新的实事，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去“求”得正确的“是”，并且用新的“是”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发展，如何在不断推进主观和客观相统一时努力做到实事求是，从而使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新时代新征程的伟大实践中熠熠生辉，彰显出强大科学真理、实践真理和价值真理的力量。

####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

版社，2023：209.

[2]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1.

[3]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316.

[4][5][6][7][8][9][10][11][12][13][14]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19，81-82，85，90，95，98，94，237，512，530，480.

[15][19][41] 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88，157，299.

[16][56][57][61][63][64][65][66]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2，101，382，10，254，62，78，95.

[17][18]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996，1013.

[20][21] 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56，303.

[22] 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272.

[23][24][25][26][27][28][29][30][32][33][35][37][39][40] 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75，174，146，64，160，370，154，357，74，79，81，58-59，121，132.

[31][34][36][38][51][52]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1668，1473，1555，1627，868，944.

[42][43][46][48][49][50][53][55][58][60][62]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80，333-334，278，143，279，364，379，143，67，114，126.

[44][67]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37-38，42.

[4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9.

[47]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6：67.

[54][59]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319，320.